

中国的军阀政治

(1916—1928)

〔美〕齐锡生 著

杨云若

萧延中

译



D693
J

2407/93

19764

中国的军阀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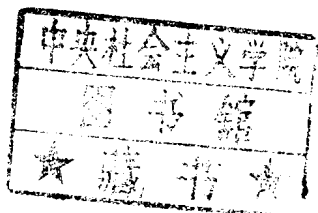
(1916—1928)

〔美〕齐锡生 著

杨云若 萧延中 译



20015391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156号

HSI—SHENG 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76

中国的军阀政治

(1916—1928)

〔美〕齐锡生 著

杨云若 萧延中 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邮码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8.25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202 000 册数：1-3500

•
ISBN 7-300-01088-1
D·157 定价：3.50元

译者的话

《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一书，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政治系齐锡生教授于1976年完成的一部学术专著。该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却将丰富的历史资料与政治学、社会学、行为学及系统理论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方法融为一体，从而在一个新的角度上，对近代中国军阀主义的形成、演变、相互关系和必然衰败的历史过程，作了较为充分的尝试性考察。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在文化心态的层面上，对近代中国军阀群体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特征，作了颇富特色和具有说服力的描述和分析，可以说这是该书的精华所在。美国汉学家 D.G.吉勒卡 (Donald G. Gillcia) 教授1977年5月曾撰文评价说：“这特别有价值的书，引用了中本文和英文的几乎所有的第二手资料，同时也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1916—1928年间的中国军阀时期的政治，进行了动态的、有根据的、有思想的和引人入胜的探讨”。①通观全书，我们认为这一评价是准确和中肯的。

尽管该书史料详实，内容丰富，但我们仍然认为，与其把这部书看成一部历史学著作，不如更为准确地把它看成是一项以中国近代军阀主义为研究标本的社会政治学著作。该书给人印象最深、启发性最大的地方，或许是那与众不同的方法和精当细致

① [美]《亚洲研究杂志》，第3卷，第8号。

的分析。例如，在该书“导言”中，作者首先对研究对象作了较明确的界定，认为“军阀”一词可以在两个角度上理解：其一是指那些持有兵权的独立政治角色（Militarists）；其二也可以指一类制造战争的魁首（Warlord）。前者是中性词，旨在表示“在某种体系中行使权力的角色”，是社会政治学的标准概念；后者则常带贬意，一般用来泛指那些依仗武力，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草寇之徒，属于日常语言系统。该书则是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军阀”概念并对之进行分析的。显然，既然“军阀”是指政治体系中行使权力的角色，那么他就不能仅仅是单个的军人首领，而只能是军人集团或军阀派系了。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这种由集团或派系所充任的权力角色，又可称为“军阀主义”（Militarism），它是“一种有组织的政治体系，其中武力通常是权力分配和制定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一旦从这一角度给“军阀”下定义，那么，各个权力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所共有的文化背景和政治性格，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就成为反映政治体系性质和特征的最重要的因素了。因而作者说：“要了解中国这个‘国家的’政治，军阀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类型，要比他们内部统治的特殊方面更为重要。任何政治制度都不是不偏不倚的，政治角色常常根据自己的意志指导自己的行为，而他们的行为又常常是受超出他们控制的某种制度的约束”。可以说，这是该书所坚持的一项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从中我们不难体会作者的匠心所在。

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抽象议论，而是在一些细微、琐碎的史实中提炼出若干发人深思的政治行为原则，甚至一反前人的固有观念，澄清并重新解释若干重要问题，也是该书值得提及的基本特点之一。例如，在论述军阀派系的组成时，作者相当详细地考证了奉、直、皖三大军阀派系内部的组织关系，指出：“军阀派系内部，家族主义广泛流行，亲戚和家庭成员能得到超过其能力的

II

重要职务，家庭关系成为直接进入上层政界最经常的手段”。但历史上也有这种情况，即某些军阀首领只让其家人担任“闲差”，而把重要的职务交给有能力的人。作者认为这种现象实际上是“血缘政治”更深层次的表现形式。因为当政治受到制度约束，随时可能面临筛选和淘汰时，他们宁愿给其亲属以较不负责的职务，但却能得到良好的待遇。“但当政治活动具有战略意义时，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政治前程不再取决于明确规定的制度上的标准，而取决于人们在失去行为准则且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时，家庭和家族就象最有凝聚力的社会集团一样，发挥巨大的政治作用”。同时，作者也清醒地认识到，“血缘政治”在军阀派系的相互关系中虽然重要，但却不是唯一的必然条件，其他诸如“利益”和“观念”等因素也同时起着作用，因此机械地套用“家庭类推法”（The family analogy）极易出现偏差。例如，军阀派系中的“大元老”（长者，老前辈）角色，虽然受人尊重，具有声望，但却不见得同时拥有权力。“如果手中没有军队，他们在政治上就极少或根本没有权威。在政治斗争中，‘有枪就有权’，而不是凭资历。这与家庭中既有声望又有权威的‘大元老’的作用有很大不同”。通过这种分析，军阀主义那极重实利，谋求权势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原则凸然而出，令人反省再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似乎约定成俗地认为，在旧中国，“当兵”是一种被强迫的行为，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谚语反映了这一情况。作者经由系统的考证和研究，认为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因为近代中国诸多矛盾的集中体现之一，可以说是民众生活的极端贫困，大量失业或半失业的状况，遍及全国的城镇和农村。在当时，由于“当兵”并不需要特殊的知识和技能，但是作为一种“职业”，它不仅“吃粮”，有时还能挣点零花钱，甚至一次抢掠以后，会得到在平时不可想象的意外

之财，况且“当兵”本身还潜存着一星点向上升迁、出人头地的希望呢！所以，对于生存在赤贫状态之中甚至之下的失业民众来说，“当兵”常常是他们求生的唯一出路。“在2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现实生活中，中国农民没有理由轻视军队。事实上，当兵却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这种近乎“冷酷”的分析，虽不能说十分全面，但却为人们考察军阀部队的兵源问题提供了思路，而且对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特征也不无裨益。

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中，作者运用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凯普兰教授的“范型”理论，在“权力均势”和“角色行为规则”的方法原则指导下，试图对1916—1928年中国军阀政治进行系统的、动态的宏观分析。应该说这一部分内容在学术界争议较大。例如加拿大籍华裔学者陈志让教授认为“以1916年袁世凯死后和1928年蒋介石执政之间为军阀统治时期，这样的分期不能说明中国近代军绅政权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它的衰落”。“最不适当的是，……把中国的分崩离析看成一个国际体系”。^①其他学者也觉得这一章有“冗长乏味”之感。至于运用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中国军阀政治具体形态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它的成败得失，我们相信读者是会自持公论的。

从该书的出版到现在的十余年中，我国国内的军阀史研究工作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大量史料得到了进一步发拙和整理，而且已有好几部系统的高质量学术专著相继问世。如果该书的翻译出版能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那将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勉力了。

译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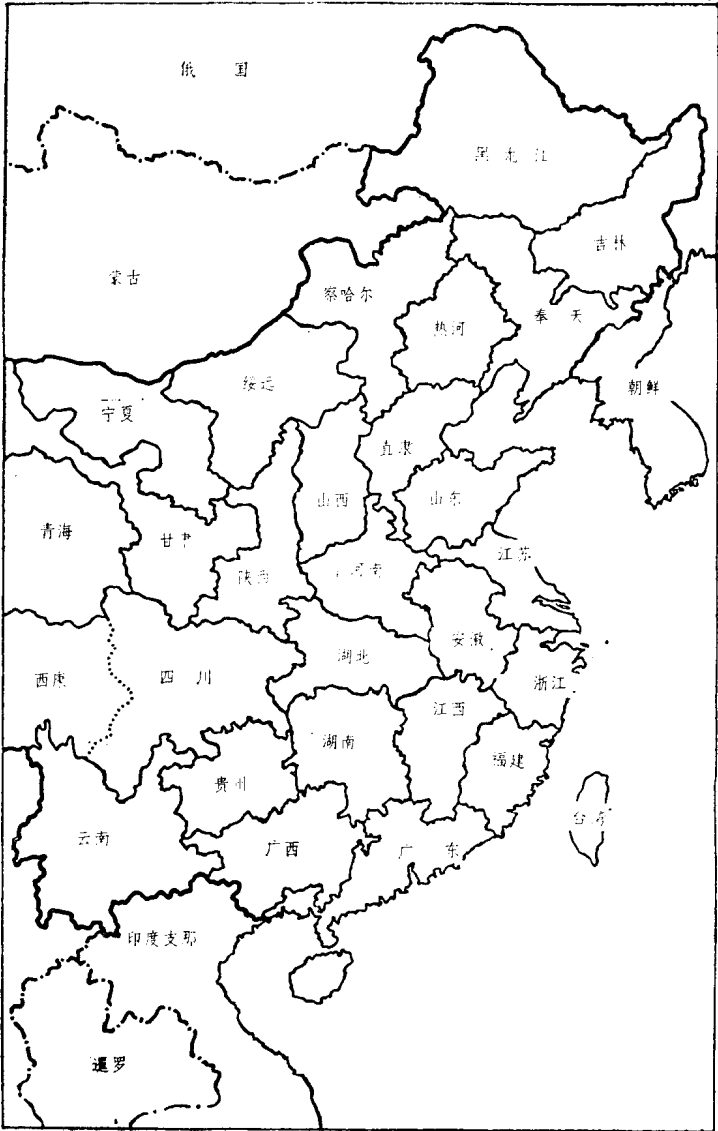
^① 陈志让《军绅政权》，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6—8页。

作者自序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受益于来自不同学科的朋友和同事的关注，他们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安德鲁·内森；北温斯顿大学的詹姆斯·谢里登；北卡罗利纳大学的杰弗里·奥布洛和乔尔·施氏茨。我特别要感激完整地审阅本书初稿的芝加哥大学邹谠教授，密执安大学的艾伯特·福伊尔沃克教授、艾伦·惠廷教授和厄恩斯特·扬教授，他们所赐予的坚锐批评，促使我改进了终稿的质量。

我也期望对我所得到的财政资助表示一点评价。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学位期间，我得到了一份在莫顿·A·凯普兰教授手下工作的福特奖学金。凯普兰教授拓宽了我的视野，包括运用国际政治理论分析国内政治问题的潜在能力。1969年，“美国国家基金会”给我提供了一个在纽约从事一个夏季的研究工作的机会。1970—1971年，我作为一个合作研究人员，在密执安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渡过了一年时间。在那里我不仅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得到了慷慨的秘书奖学金，而且被置身于一些美国最奋发、最有成就的中国专家之中。这种知识氛围是所有人都期望能在其中从事研究的工作环境。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妻子苏薇，甚至在最黑暗的年代里，她也从未放弃过在道义上对我的支持。没有她的乐观、智慧和不知疲倦的鼓励，这项研究将永远不会完成。



1916—1928年的中国各省区划图

目 录

第一章 导 言	1
第二章 军阀派系的出现	10
历史背景 (11)	1911—1917年军队的作用 (14)
1917—1920年军人派系的产生	(17) 结论 (30)
第三章 军阀派系的组成	33
个人关系的结合 (33)	自身利益的考虑 (42)
思想上的联系 (49)	这些因素在派系结合中的 作用 (51)
第四章 军事能力：招募新兵	70
第五章 军事能力：训练	83
纪律性方面的训练 (83)	技术训练 (93)
结论 (105)	
第六章 军事能力：武器和战术	108
武器 (108)	战术和战略 (119)
结论 (134)	
关于地理的重要性 (135)	

第七章 经济能力	141
固定的收入来源 (142)	特殊的收入来源 (147)
军阀的财经政策评价 (159)	
第八章 军阀政治的行为准则	171
个人行为准则的特点 (171)	对待其他军阀的 行为准则 (176)
考虑政治合法性的行为准则 (181)	
第九章 中国的政治体制	186
静态分析的局限性 (187)	军阀政治的系统分 析 (191)
中国军阀政治的发展阶段 (196)	
结论 (219)	
附录一 1916—1928年间中国政治领导人	226
附录二 1916—1927年间各省最高军事长官	228
附录三 1916—1928年大事年表	230
附录四 参考书目	236
译后	250

第一章 导 言

任何一个稍微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1916—1928年时期的两个情况：第一，那是“军阀”时期；第二，那是一个混乱的破坏性时期。

中国现代政治史对于这个时期的说明，往往是只有很少的报导，往往是介绍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甚至比较专门的研究也往往不能对“军阀”的作用提供完全的和确切的说明。造成这种空隙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复杂和混乱的情况，掩盖了这个时期政治角色的活动；同时，也缺少合适的工具书。因此，“军阀主义”就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薄弱的环节。^①

某些学者考察这段时期时只注意传统的、合法的政治制度。

^① 在这本书中，“军阀”（militarists）这个名词是指个别的政治角色。虽然“军阀”（warlord）是一个通常惯用的名词，并用来作为这本书的书名，以表示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时期，但是它含有轻蔑、非难的意思。甚至在20年代，对于究竟谁是一个“军阀”，谁不是，常有争论。其要点在于“军阀”的含意究竟是什么。一个受人尊敬的军事领导人不会被称为“军阀”，这个名词常用来称呼坏的军事领导人。C.M.威尔伯曾明确军阀主义是“一种有组织的政权体系，其中武力通常是权力分配和制定政策的决定因素”。参阅：《1922—1937年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军事分散主义和重新统一的经过》。引自何炳棣《中国在危急中》第1卷，第203页。下文同样避免对角色做出评价，一个军阀只是在这种体系中行使权力的角色。

他们承认在政治上存在有力的军事角色，但仍认为中国是一个单纯的政治统一体，中央政府是政治活动的中心。这种观点自然导致认为宪法、总统、内阁以及国会都是中国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

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稳定的，这种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华民国的基本结构及其发展。但困难的是，在中华民国建立13年后，至少有四种不同的宪法，在它们颁布后不久就立即成为一张废纸。其他的法律和规章也很少显示政府的性质和职能。^① 政治体制常有变动，在这段简短时期中政府历经君主制、共和制、摄政制等等变化。除了政治制度改变之外，仅在北方，在1916—1928不到12年的时间里，政府首脑改换了9次，平均存在时间不到16个月。在南方，“抢座位”游戏的现象同样在国民党政府发生。

内阁也是同样的混乱和不稳。1916—1928年期间，有24次内阁改组，有26个人担任过总理。^② 任期最长的是17个月，最短的是两天；平均存留时间是3—5个月。内阁在位时间不长，不能制定长期的政策，而且，根据共和国的根本法，内阁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制订决议的机构；它是军阀把它们的意志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最驯服的行政工具。^③

① 董威廉 (William Tung) 对1911年至1918年的72件公文进行了总体研究，其中包括宪法、宪法草案、法规以及国家、省和地方政权的正式组织编制。他的结论是，那些法律和规定几乎得不到服从和履行。参阅：《现代中国的政治组织》，海牙，1964年版，第380—385页。

② 陈西章《北洋沧桑史话》第2卷，台北，1967年版，第503—508页。

③ 如果内阁确实是国家政权（北方的）的一个机构，本可期望北方人能把政权控制在他们同乡的手里。结果，恰恰相反，在26个总理和95个内阁部长中，南方人的数字压倒了北方人，几乎是2：1。（这些部长们的传略，可参阅陈志让《北洋》第2卷，第517—540页）。由于在这个时期的政界中是强调个人关系和地方联系的，对于上述矛盾的解释只能是内阁本身并没有实权。事实上，内阁成员仅仅是强大军阀们的仆役，并可以随意任免。

更不用说国会了，它在公众眼里比总统、内阁更不足为信。它用不正当的办法产生，数次被停止职务，它成为一个完全腐败的、无能的、寄生的机构，充满了无聊的政客。20年代，它分裂为亲北京和亲国民党两派，后来干脆在公众的蔑视中衰败。1923年国会的许多成员接受贿赂使曹锟当选总统，使他们得到了“猪仔议员”的绰号。很难把这些人当作重要的政治因素。

以上简短叙述足以说明，通过传统的、合法的制度去说明中国政治，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因为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一个立于政权机构之顶峰的独立的中央政府，其中的各派军阀都轻视它。政治角色的行为，很少感到有必要遵守任何制度上的规定。最重要的决议不是由北京，而是由地方政府独立决定的。

着眼于合法的政治制度的研究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可以称之为两极途径。这个途径强调这个国家中的政治分裂：在北方，军阀是很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在南方，则是高度的政治觉醒并结合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在谈到“北方”和“南方”时，他们认为中国有点类似两极的局面，即在两个政治地理区域之间存在着直接对抗。^①这种研究方法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它夸大了南方的作用，并把北方的政治军事力量看成是一个毫无区别的范畴。它还倾向于认为，南方的组织特征就是在这段时期中的大部分时间没有真正掌权。此外，以这种方法进行研究，使不少学者陷于许多争论，例如关于宪政和合法性问题，这对于大分别的政治角色来说，最多只有一些附带的联系。

两极研究途径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有四个原因：一、所谓“北洋集团”决不是一个统一的巩固的集团，在这个时期大部分时间里，这个集团的成员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斗争；二、南方同样

^① 陈功甫《中国革命史》，上海，1930年版；李方成《中国近代史》，台北，1960年版。

为内部不断的倾轧和骚扰，也不是一个统一的集团；三、在这两个集团的重要角色之间经常有交叉的联合；四、一直到这个时期的后期，国民党才在南方真正建立起一个坚强的根据地。它的早期存在是名义上的，无关紧要的。在这些年中，政治活动围绕着某些关键的北洋军阀转，国民党的存在（或不存在）对北洋军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种研究方法更多提供一个胜利者对历史的解释，却很难公正的判断北洋军阀在国民党成为有力的角色之前，曾长期地控制着当时的政治局面。

只是在最近，某些学者开始注意我们对早期中华民国历史知识上所存在的空白。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了过去研究的焦点，探索新的领域和新的因素来说明中国政治。有的人已得出结论，最重要的政治现象既不是已倒台的北京政府，也不是南北之间的斗争，而是军人在政治中的作用。R. 鲍威尔(Ralph L. Powell) 和F. F. 刘已对这种现象作了很有意义的研究。^① 至少已有两篇关于个别军阀（冯玉祥、阎锡山）的专著出版，还有若干尚未出版的论述别的军阀的博士学位论文。^② 然而，文章毕竟还是较少，1916—1928年这段历史还需要探索。

帮助我们缩小知识中的空白办法之一，是更多的关于这个时期主要军人的传记论文。一般来说，这些专论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当时没有全国性的政权，中国的政治最好理解为被强大的军阀统治了不同地区或地方政府。大量收集这样的研究之后，通过归

^① R. 鲍威尔 (Ralph L. Powell) 是最先强调军阀在中华民国中的重要性。他在《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普林斯顿, 1955年版) 中, 对北洋军队的起源给予了详尽的说明。F. F. 刘的《1924—1949现代中国军事史》(普林斯顿, 1956年版) 则集中探讨了民族主义的军阀机器及其政治影响。

^② J. E. 谢里登 (James E. Sheridan) 《中国军阀: 冯玉祥的一生》, 斯坦福, 加里弗尼亚, 1966年版; D. G. 杰林 (Donald G. Gillin) 《1911—1949年: 山西军阀阎锡山》, 普林斯顿, 1967年版。

纳使我们对整个中国有一个确切的概念。换句话说，增加对这些个别的军阀和他们的政权研究，可以使我们把它们集合成一个整体，产生一些主张和想法，甚至可能掌握全部关于中国政治的系统知识。

这个计划，必须在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这个国家中大部分重要的地方政权都弄清楚之后才能完成。目前的研究，虽然都很积极，还不能说已接近这个目标。而且，已研究的少数几个军阀只是当时的典型代表，我们不能通过这几个特殊角色就画出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的一张总图。我们需要更多地知道大多数军阀统治着中国其他——也是十分重要的部分——地方的情况。但是，在较长时间内，这种全面的研究是不易做到的。^①

研究个别军阀确实是了解中国政治的一种正确的方法，但它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我们即便获得了所有军阀个人和他们的地方政权的详细材料，还需要弄清许多问题。专门集中研究军阀个人或政府的危险倾向之一，会太深的陷于琐事之中，对于中国政治产生一系列杂乱且支离破碎的感觉。在大量军阀政府的资料中，必然会有许多分歧和相似之处，需要我们经过提炼、分类，放入适当的范畴中去，以便画出一幅精确的总图。

如果上述的看法是对的——我相信是这样——，那么我们不必为缺少大多数重要军阀的材料而苦恼。因为，要了解中国这个“国家的”政治，军阀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范例比他们内部统治的特殊方面更重要。任何政治制度都不是不偏不倚的，政治角色常

^① L.W.派伊的《军阀政治》（纽约，1971年版）一书，本想系统地论述军阀政治。虽然该书1971年才出版，但是它的基本研究工作却是在二十年前进行的，主要依据当时的英文资料和少量中文材料，并没有吸收后来出现的大量重要和次要的研究成果。这本书的整个论述都显示出了这个缺憾，并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理论上的分析。

常是根据自己的意志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而他们的行动常常是受超出他们控制的某种制度的约束。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否认，政治角色（或指事件，人物）决定行动和目的时，总被某些有力的客观因素约束着。研究这些因素可以揭示军阀活动的重要方面，而如果仅仅研究军阀内部情况这些很可能被忽略。这本书就是要把研究视野从个别的军阀政权内部与周围无联系的政治现象转移到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以便对1916—1928年时期的中国政治发展有一个总的了解。我们希望以宏观的观点而不是微观的方法研究这个时期。^①

我们的分析与微观的研究有某些根本的不同。微观的研究往往是研究一个军阀或他的政权，往往是折衷地组织材料。当作者研究这个人或他的政权的某些方面时，他常常并不说明指导此研究的基本理论，也不清楚地说明他所研究的各个不同的方面之间的联系。它根据自己的标准选择、排列事实。目前仅有的几个用微观的方法研究20世纪初期军阀主义的作者，都有其不同的途径，不同的重点。因此，从他们那里确实很难对军阀主义得出一个总的概念。

我们的工作是以系统理论的标准作指导。微观的研究方法是组织历史资料以说明一个军阀或他的政权的毫无联系的个别的事件，系统研究的途径则试图把历史资料组织成有区别而又有联系的范畴。通过对一系列可变因素的选择，树立一个表示特征的行动范型，并把它从周围环境中独立出来。资料根据明确的标准，进行有系统选择和检定。

^① 无论进行宏观的或微观的研究在内的一些理论问题，在戴维德·辛格（J. David Singer）的《国际关系的分析标准》有所讨论，载克劳斯·诺尔（Klaus Knorr）和西德尼·费巴（Sidney Verba）《国际制度：理论文章》，普林斯顿，1961年版，第77—92页。